



浩泉

浩然



—— 浩然的自传体小说

活泉

浩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泉:浩然的自传体小说/浩然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 重印

ISBN 7-02-001620-0

I. 活… II. 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895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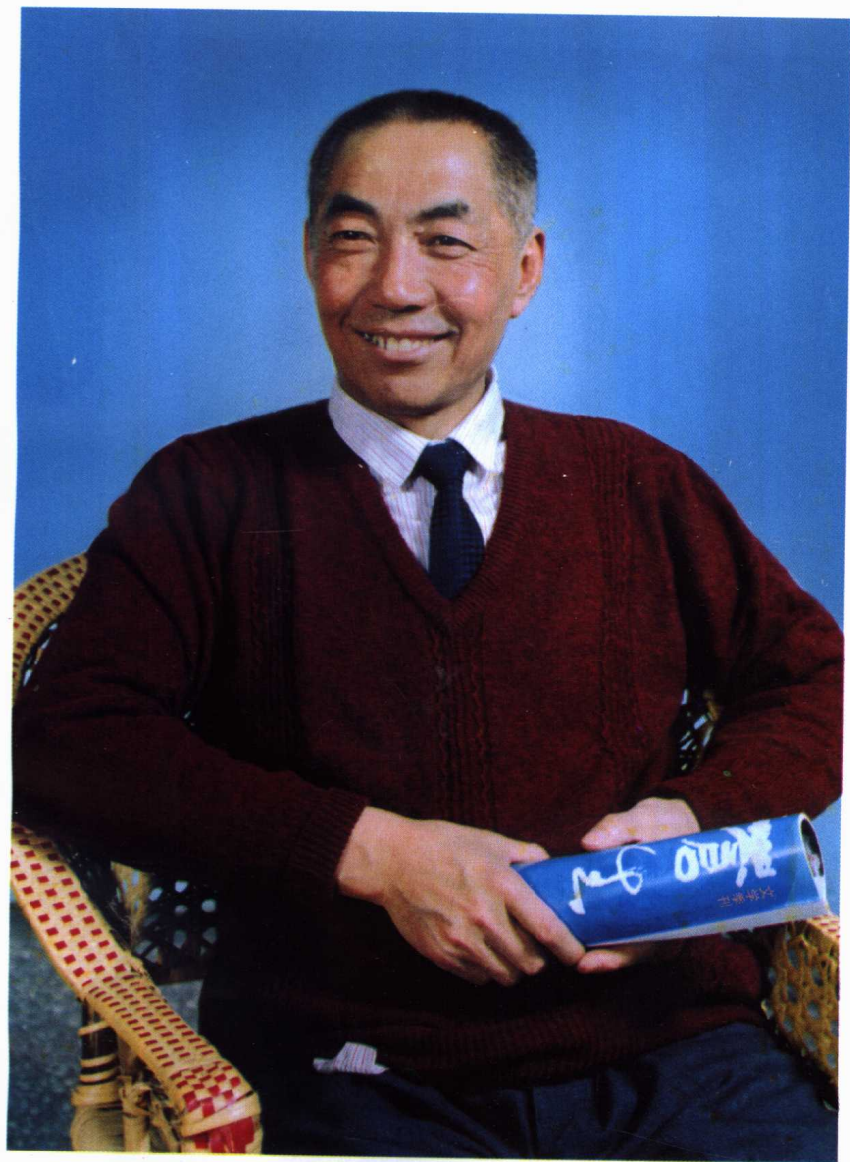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6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5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941—10940

定价 17.20 元



一九九二年六十岁生日摄于通州镇



一九四九年当区干部时摄于蓟县

第一章

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迈动着两只脚，一切都感觉很沉重——枣木碾棍子很沉重，青石碾砣子很沉重，腿沉重，头沉重，两只眼皮尤其沉重——它一个劲儿朝下压，朝下压；每压一下，脑袋里就“轰”的一声雷鸣，眼睛里就“忽”的一团黑雾，整个身子如同在没有底儿的山涧坠落，一节儿一节儿不停地坠落着。

姐姐在后边大声吆喝：“推呀，快着点儿往前推呀！”

每一声的吆喝，都吓得我一哆嗦，清醒片刻，强打精神，移动两步，紧接着又是一种沉沉重重的压力向我袭来。这中间，我还闪电般地做了个闪电般的梦，梦见两年前跟随母亲从矿区往乡村搬迁的情景。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情景。好像坐着骡子车，坐在大包小包的破烂行李上。摇摇晃晃，昏昏沉沉。路是长的，长得如同转不到头的碾道。路是不平的，不平得跟这碾道一样让人磕磕绊绊。路两边的景物是单调的，要么空空荡荡，要么一个模样的低矮的土房，一种姿态的枯干的丛林。还有那个越追赶越离着远的太阳。追不上的西坠的太阳，混浊而又没有生气。于是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致看一眼，总是扎在母亲怀里打瞌睡。从开滦赵各庄煤矿到蓟县王吉素村，除了在别山镇外二里店的夜宿之外，留给我的记忆几乎都是“睡”：睡得很累，睡得腰酸腿麻，又睡得极为香甜。至今我还想那么香甜地睡一会儿——又是一声雷鸣、一团黑雾、一种坠落……

“哎呀，你这是咋回事儿呀？”身后边的姐姐提高了声音，朝我吆喝，“赶快把这底儿推完，好回去给妈做饭吃，你偏这么磨

磨蹭蹭！”

母亲，还没有喂饭的母亲，正在家里等着我们！

我使劲儿咬住下嘴唇，咬得很疼，用来驱赶着瞌睡，抖掉无形的沉重负担，打起精神，随即奋力地推动着青石碾砣子。

自从我们在王吉素村舅父家住下之后，母亲的一双眼睛就越来越昏花，身子骨就越来越消瘦，吃饭不香，总想躺着。特别是那次她跟舅父闹了一回气、吵了一次嘴，脖子就开始红肿，后来渐渐地破了头，从溃烂的地方不住地流黄水。母亲无师自通地说：她害的这种病叫“鼠疮”。喝了好多照偏方采集、煎煮的草药水，吃了几次不放盐粒、清水炖的猫肉；烧香求佛的事儿更是每天都不可缺少的治病祛灾的举动。结果呢，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倒明显地加重，一个冬天里都卧在炕上没有起来。照料她的事全部落在我和姐姐的肩上：听她痛苦地呻吟，给她做面条汤吃，替她端屎端尿。年纪小，白天黑夜地连轴转，日子久了熬不住，站着都困倦得打盹儿。

我们终于把一碾盘经过水浸的白棒子粒儿轧碎。姐姐用借来的马尾罗子筛下一些细面，我端着，两个人相跟着回到家。

进了堂屋，姐姐就赶紧往棒子面里掺些白面，擀面条；我收好簸箕急奔我们住的东屋。

蜷伏在炕头上、皮包骨头、不停捋气的母亲，吃力地招呼我：“憋得难受，扶起我来坐坐……”

我连忙抬腿迈上炕，从背后抱着扶起母亲那枯柴一般的身子。

没容她坐稳，没容我拽过枕头来给她倚在后腰上，只听得母亲的嗓子“咕噜”一声响，像咽下一口菜饭，头就随之沉重地垂落在我的肩膀头上，两只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

我惊慌地朝堂屋喊：“姐，快来看看，妈这是咋的啦？”

在灶前做饭的姐姐，听到我异样的叫声，带着两手面就窜进来，扑上前，用力地摇撼母亲的身体，连声地呼唤：“妈，妈，妈呀！”

母亲再也不能说话，再也不能动一动。

姐姐吓得脸色苍白，撒腿就往外跑，跑到院子里喊叫：“老舅呀！老妗子呀！”没有得到回应，就边跑边喊，一直喊到街上，又喊了回来，仍然没有喊到人。

身边没有一个大成人给仗胆儿、做主，我们两个孩子又慌张又害怕，傻呆呆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幸亏住在北边那层房里的邻居、我按庄亲叫大舅的宋辉之，听到我们这边不平常的声音，就走过来看。他过去在邦均镇上的大饭铺当过厨子，为人和气，爱干净，热心肠；提到乡村以外的事儿，他跟我母亲很谈得来。这会儿，他撩开布门帘儿一看，就急忙问：“你们这是怎么啦？”

姐姐上前拽住人家的棉袄袖子，带着哭腔说：“大舅呀，您快看看我妈……”

宋辉之听了打了个愣，迈进门坎儿，走近前来，很有经验地伸出手掌，在母亲的鼻孔上方停一下，随后不慌不乱地对依旧紧紧抱着母亲的我说：“放下吧，让她躺舒服点……已经咽气了……”

就是这么平平常常，就是这么简简单单，我们的母亲，紧跟在死去三年的父亲身后，狠心地扔下我们走了，变成了她经常向我们讲述的那种鬼魂，奔向她不断给我们描绘的那个阴曹地府。

我和姐姐开始悲痛地哭嚎。

我们趴在母亲那渐渐变冷的尸体上哭。

我们拍打着装殓了母亲的薄木板的棺材哭。

我们陪伴着左邻右舍来吊孝的女人们哭——实际上，她们大多数只是在亡人的尸体前干叫喊，或者干唠叨几句，并不真情诚意地哭啼，倒是转过身围上我和姐姐的时候，才有了实实在在的悲哀；同时，很动心地、小声地数说几句什么，对我们表示出格外的亲近和怜悯。

住在北院的三妗子给母亲烧过纸以后，回身抓住我的肩头，脸冲着对门院子住的吴家表奶奶，一面揉鼻子一边叹息：“这么两个小人儿，就让她撒开手扔下了，可咋活呀！……”

吴家表奶奶朝她点头，揉揉红了的眼睛，搭腔说：“是呀，是呀，没爹没妈就够苦命的了，连个当家子、同姓的人都没有，怪可怜的！”

她们的话，仿佛锋利的针戳在我这嫩弱的心上。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和姐姐成了孤儿，成了人世间最可怜的那类孩子！

我哭了，趴在炕上，更伤心地哭了；没有泪水，干哭，撕心裂胆地哭，好似从胸腔里往外滴血。

第二章

办丧事的时候，舅舅和妗子里里外外地忙碌，确实很辛苦，也很麻烦。一切辛苦和麻烦的事情，他们都主动承担起来。而且那几天家里的气氛除了悲哀之外，还有一种默契的和谐。特别是舅舅，他那张一向冷冰冰的面孔，不再那么紧紧地绷着，显着温和；还表示出一点对我们很心疼的样子，亲自嘱咐我暂时不用再到地阶和山坡上拾柴禾叶子，够烧就行了；他说天太冷，

免得冻坏了手脚。

其实，我家的丧事办得再简单不过了。病人头天咽气，第二天下葬，第三天把她用过的东西清理清理：洗的洗，扔的扔，烧的烧。有一条拿鸡毛装成的破旧褥子，是父亲铺过的，被病重的母亲弄脏。我们不懂脏了的鸡毛褥子洗涮后晒干，照样还能使用。我和姐一齐动手，把那蓝布口袋似的褥子抱到院子，剪开褥面，把鸡毛倒在猪圈里。结果让太阳一晒风一吹，到处都飞扬着我家的鸡毛。对此，舅舅气得直哼哼，忍耐着没有跟我们发脾气。

我和姐姐呆在家里没事干，心里空荡荡的；外面冷，我们穿得单薄，不敢到街上玩耍，也没心绪到外边玩耍。

我们坐在并不热的土炕上，四条小腿伙搭着一条棉被，耳朵听着街上的声音，脑子里胡乱地想；想到一个有趣的或疑难的问题，就扯谈几句。

姐姐忽然问：“你想妈不？”

我反问：“你呢？”

姐姐忽闪着两只潮红的大眼睛低声回答：“我怕妈不放心咱俩，想咱俩……”

这当儿，姪子走进屋来，说：“今儿个是圆坟的日子，包几个饺子，给你妈送去，烧几张纸，供一供。”

我们俩应声跳下炕，一齐动手包饺子。急着到坟地去看母亲，也想让母亲看看她的一双儿女是何等的孤苦、怎样的悲哀。

冬季的天空，没有飘动着白云彩，也没有飞卷着黑云彩，只是笼罩着一种单调、呆滞的灰暗。光秃秃的田野，被土埂地阶隔成一条条、一块块，裸露着石头蛋、谷茬子，还有躲藏在垄沟里曲蜷成球的豆角叶子。一切一切都是一片毫无生气的样子。村西是庄稼地，很少树木，东一棵西一棵地孤零零站着一些，也

都是无精打采的模样。小路弯曲、狭窄，坡坡坎坎。路面上铺着黄土和石头子儿。黄土被踩成碎末末，没有风就往鞋和袜子里钻，刮风就冒烟。石头子被挂了铁掌的驴蹄子磨去了棱角，变成圆的、扁的多种多样，一踏上去就相互冲撞、排挤，“咯吱、咯吱”地响。

姐姐拎着荆条篮子。篮子里边放着一只盛素馅饺子的碗，还有一小卷黄烧纸。

我扛着一把铁锨，跟在她的后面，手里攥着一盒火柴。那小小的刨花皮做成的盒子里，只剩下几根火柴，随着手的摇摆，我感到它们在不安地跳动，在悲哀地鸣响。

走到临近头道沙河的岸边，我们拐进种了越冬秋麦的地里，顺着垄沟往北走。我们家除了北山三郎寨的那片梯田、果园之外，另外还有两块平地：村北边的那一大块，村西边这一小块。这种平川地，都是在山前边的丘陵上开垦出来的，地面极不平，整个地势也是南边洼北边高。我们一面走一面看北端插着纸幡的黄土坟头，它好像离开地面而悬空地挂着。

到了跟前，我先用劲儿铲了几锨土，填在没有完全干的坟上。

姐姐从篮子里端出早已冰凉的饺子，摆在坟的西南边用手抚平的地面上，随后抖落开烧纸卷，揭下几张往地上放。

我赶紧背着风，小心地划火点着。

我们一齐跪在土坟的前面，你一张我一张地往微弱的火苗上续纸。不等火苗子熄灭，就赶快续上一张，直到把一卷子纸全部烧完。黄草制成的纸，变化成黑色的纸灰，随着“嗖嗖”的小风，一片一片地纷纷四散着翻滚跌落。

我们默默地跪了许久，就把两条酸麻的腿伸到前面，顺势坐在地上。看着纸灰被风吹刮得无影无踪，任凭寒风穿透衣服，

给碗里的饺子蒙上一层土灰。我们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哭。这几个月里，日日夜夜地守候垂危的病人，实在把我们给累垮了，好像耗尽了浑身的力气。这三天里时不时地哭一场，如同把泪水哭干了，仿佛从此再也流不出一滴。

姐姐终于开口：“我们应当再哭一场。”

我说：“哭顶啥用，能把妈哭回来？”

“倒也是。听见咱们哭，她更得惦着。”

“惦着管啥，能把我们带走吗？”

姐姐连忙伸手堵住我的嘴：“不许你再说这种丧气话。妈不会带走我们，妈盼望咱们活得结结实实的，给她争气，给她作脸。”

忽然，我想起北院的三姑子和对门的吴家表奶奶哭灵那会儿说的那句话：我们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成了无依无靠的可怜虫。这当儿，她们的话，不停地在我的心里翻腾，反复地在我的耳边鸣响，同时也勾起我许多胡思乱想，而且有许多不是我这么小年纪的人应该有的思想。

我和姐姐如同两棵小草，被人生的旋风从二百多华里开滦赵各庄矿的甜子山旁边，吹刮到陌生的鹰爪子山前这小小的村庄，就随手抛下，而风却任意地远去：升天堂了，或者入地狱了。这块落脚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它既不是祖籍宝坻县单家庄，也不是真正外祖父家大徐庄子。这个王吉素村是母亲小弟弟——我舅舅前来当“倒插门女婿”的地方。此时此地，只有舅舅是我们唯一的亲人。事实上，他对我们并不亲，我们对他自然也不亲。宝坻县老家那边，姓梁的倒有一大户，有四位“一爷之孙”的哥哥。他们四位都比我们年纪大，不仅已经成家立业，而且都属于“子女满堂”的人。自从父亲死后一直到母亲死，那边压根儿没有来人看过我们。听说大伯已经不在人

世。大妈还健在。她跟母亲妯娌间不和睦，我们早就有所见闻。然而，我们的四个哥哥，都具有梁家人的血统特点：厚道而热情。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甚至于不捎个口信来问问我们活得怎么样呢？是大妈不允许他们关心我们呢，还是他们有所戒备，怕一招引我们这孤儿寡母，会变成他们的负担和累赘呢？这样无亲无近、无依无靠的两个孩子，可怎么活下去呢？……

我呆呆地望着头顶上灰蒙蒙的天空，又望望北边雾气茫茫的山峦。不禁揣想起母亲的心意。她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好强。“人活着要有正气，要有志气”是她的口头语。她曾经殷切地希望我的父亲是个有志气的男人，干出一番与众不同的事业，给她露脸，让她沾光。结果，父亲什么正经事情都没有做成，反而沦落为一个“落道帮子”、“耍钱的赌徒”，最后为一个风骚女人而断送了性命。这样的打击，对母亲来说，其沉重程度是无以伦比的。她不屈服，她要挣扎，她把扭转乾坤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她唯一的儿子——我的身上了。我对这一点，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渐渐地心领神会了。在赵各庄矿区，别的女人不仅自己只想着钱，只奔钱，还诱导，甚至逼迫未成年的儿女为她干种种抓钱、捞钱的勾当。母亲却与众不同。她千方百计地送我进教育馆小学念书识字。她曾为我不知道用功读书而大为伤心，狠着心责打过我。搬到王吉素之后，孤儿寡母，度日维艰。可是她仍不顾手头拮据，无视舅父的不悦，坚持让我到对门吴希颜老先生的私塾里继续念书。半年间念了《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大学》、《中庸》：买了《孟子》才念一段“孟子见梁惠王……”她就病卧在床，我就中断了学习……在乡村过日月实在太苦。没有矿区的那种电灯，只能用棉花搓成的捻，蘸着豆油照明，而且没有多少油供给使用。更见不着赵各庄街道

上那种一压就流的自来水；都使用手摇辘轳，从八丈深的井底捞泥汤，倒在缸里澄清了再用。特别是到地里干活计，到山上割草打柴禾，经常饿着肚子干，顶着毒热的太阳干，冒着刺骨的冷风干……多难熬呀！怎么熬下去呀！

后边这句话，我想着想着竟然不知不觉自言自语地说了出来。

姐姐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就搭腔安顿我：“多难也得熬下去，没娘的孩子更得长出息。”

我反问她：“什么叫出息呀？”

她说：“好好学着过日子。”

我吼叫起来：“快算了吧，过这号日子，可有啥奔头呢？”

我们姐弟第一次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她说过眼下这种日子有奔头，我说没有奔头，各不相让。这样的问题，实在不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所应该想的，尤其不该是一对农村娃娃所应该争论的话题。然而，我毕竟不是个农村娃娃，我使用过电灯，用过自来水；我还看过火车、汽车和高高的砑子山；我尤其听过无以计数的民间传说、瞧过许多种戏曲，比乡村里那班同龄的小朋友懂事儿多、醒世早。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不得不超前地启用我的见闻知识，超前地思索人生之路。

跟姐姐争吵来争吵去，我也苦苦地想，反复地掂量，就自然而然想到母亲在世那会儿讲的民间故事和在赵各庄燕春楼戏园子看过的几出戏，心里豁然一亮，即刻转忧为喜，异常兴奋地对着仍然在发愁的姐姐说：“嘿，有主意啦，我长大了要去当官儿！”

姐姐没听懂我的话，不经心地问：“当官干啥呀？”

“当官儿好。”我认真地给她解释，“妈怪爸爸没出息，就是因

为爸爸当种地的庄稼人没有当好，当下煤窑的工人也没有当好，当挣钱的买卖人更没有当好，才落下那么个坏下场。让妈生气，让我们也跟着受罪。你想想妈讲的那些故事里的人，还有那些戏里边的人，不论他们多穷多苦，不论他们遇着啥灾难，只要最后一中状元，当了官儿，就苦尽甜来，啥都变好了。这就是妈活着的时候说的志气。我要长志气，去当官儿。”

姐姐听罢想了想，摇摇头：“你倒会做梦，想当官儿就能当呀！”

我早有主见：“能。好好念书，就能当上。”

姐姐把我的这番话琢磨一下，点点头。过一会儿，盯着让烧纸熏黑了的那土地说：“你好好念书吧，中状元当官吧。我念不成书啦。乡庄没有闺女家念书的。我学针线活，给你做衣服穿；将来你荣华富贵，我也跟着沾光。”

得到姐姐赞成，我越发充满信心：“你就等着吧。”

我和姐姐坐在母亲的新坟跟前，做开了美妙的梦，越做越美。受了创伤的幼稚的心灵，仿佛一下子康复了，眼前是一片五彩缤纷的前途远景。

第三章

母亲有两个同胞兄弟，都是她背着抱着带大的。在他们年小的时候，我的外祖父过得很穷，不好度日，就从蓟县南部平原上的大徐庄子，搬迁到蓟县北部山地的早店子村给地主看坟地，同时还给另外的人家扛长活，外祖母是个替有钱人家做饭、洗衣的使唤人。夫妻二人早出晚归的不能顾家，我的两个年小的舅舅就由我母亲背一个、领一个，在草屋、在坟地四周哄着玩

要，看管着别摔别碰，帮父母苦熬岁月。

大舅名叫苏全荣，高个子，由于叔伯弟兄排行老二，我们叫他二舅。他为人厚道，“心里秀”，自己钻研着认识不少字，能够津津有味地一遍一遍地看古典小说《红楼梦》。他干了几年庄稼活儿，后来一直在赵各庄下煤窑。小舅名叫苏全祥，是排行兄弟间的老四，亲姐弟三个里边却是顶小的一个，所以我们都叫他老舅。老舅机灵，心眼儿多，而且不安分。他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队伍里当过兵，在东三省什么地方学过剃头。二十多岁出天花，差点儿要了命，结果在脸上落下一些浅碎的麻子。这样的一场灾难倒使他收了心，来了个败子回头，决计要回老家过庄稼日子，当个殷实的庄稼主儿。我母亲支持他的行动，把出卖老家宝坻县单家庄土地房屋的钱，还有在赵各庄背着我父亲零星积攒的钱，都偷偷地交给他，由他在王吉素买下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一所空宅基，以及一个果树园子和十亩平川地。有这样可观的家产，才使他那么一个没有锥扎之地的流浪汉有了安身立命之所，王吉素村的老宋家才肯把一个十七八岁的闺女嫁给他这三十多岁的男人，以至于才使他有了家室，有了儿女，在王吉素扎下根子。

母亲活着的时候，对待老实厚道的二舅不亲近、不热情，动不动就加以训斥，而对待“机灵鬼”的老舅则格外地宠爱，无保留地信赖，任何秘密事儿都跟他说，都交他办。当初我们住在赵各庄矿区，每逢老舅从蓟县来到我们家里，母亲总是格外欢喜，有多少不痛快的心事，也会立即抛到一旁；一面给老舅做最好吃的东西，一面跟老舅嘁嘁喳喳、嘀嘀咕咕，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儿。这跟老实的二舅到我家的情形，尤其母亲那副冷淡的模样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差别极大。老舅每次从蓟县到赵各庄看望，最多住两三天，有时甚至睡一夜就匆

勿离开。老舅临走的头一天夜晚，母亲是最忙碌的。她一定要早早地打发我们上炕躺下，而她和老舅很迟才睡。有一次，我躺在被窝里假睡，偷偷地察看他俩的动静，果然发现一桩新鲜事儿。母亲从破墙壁的缝隙里掏出一卷卷被乱头发缠裹着的票子，抖落开，再装进老舅身穿的破旧长袍的棉花套子里，最后把布面子和布里子再重新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我看着挺奇怪，忍不住地开口问：“妈，你怎么把钱都缝在棉花里边呀？”

母亲和老舅都没有防备我，所以被我这突然的一声吓了一跳，慌乱不堪地收卷起棉袍子，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保险。

我坐起身，想用手摸摸老舅那件装了许多纸票子的棉袍大襟儿，越发增强了好奇心。

母亲惊恐未消地、发怒地奔过来，把我摁倒：“哪有什么钱？你做梦哪！快睡觉吧！”

我故意逞强地喊叫：“你骗人。我看见了，我全都看见了，都缝在棉花套子里边！”

母亲打个沉，随后严肃地警告我：“你可不许告诉别人，也不许对你爸爸说。”

“为啥还瞒着我爸爸呀？”

“哼，他要是知道了，都得拿到赌场去输个精光。”母亲小声地带着感伤的表情给我作进一步解释，“妈为了你们，不能不长点心眼儿，不能不留条后路……让你老舅把钱带回乡下去，给你买地，买房子，将来好娶媳成家。”

老舅在一旁插言说：“如今老打仗，地产便宜，多弄点地，往后你们过好日子呀！”

母亲说：“土地才是根本，咱们不能老在外边瞎混，不能把你也给耽误。……妈要争这口气！”